

去远方长大。成功在脚下，做会走路的人
林海音女儿夏祖丽 带你感觉她感觉过的世界

天堂鸟小姐的刷子

夏祖丽◎著



海峡出版发行集团
THE STRAIT PUBLISHING & DISTRIBUTING GROUP

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
FUJIAN CHILDREN'S PUBLISHING HOUSE



天堂鸟与奶瓶

夏祖丽◎著



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| 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
THE STRAITS PUBLISHING & DISTRIBUTION GROUP | FUJIAN CHILDREN'S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天堂鸟与奶瓶刷 / 夏祖丽著. — 福州: 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, 2016.6

(台湾儿童文学馆·城南书坊)

ISBN 978-7-5395-5657-4

I. ①天… II. ①夏… III. ①儿童文学—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87.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080092 号

天堂鸟与奶瓶刷 —— 台湾儿童文学馆·城南书坊

作者: 夏祖丽

出版发行: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

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

http: //www.fjcp.com e-mail: feph@fjcp.com

社址: 福州市东水路 76 号 17 层 邮编: 350001

经销: 福建新华发行(集团)有限责任公司

印刷: 福州德安彩色印刷有限公司

地址: 福州市金山浦上工业区标准厂房 B 区 42 幢

开本: 635 毫米 × 890 毫米 1/16

字数: 63 千字

印张: 10.5 插页 2

印数: 1-10190

版次: 2016 年 6 月第 1 版

印次: 201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395-5657-4

定价: 16.00 元

如有印、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直接与承印厂联系调换。

联系电话: 0591-28059365

总序

英子不老

夏祖丽

母亲的童年回忆在北京城南游艺园里的那些说书、京韵大鼓、杂耍、变戏法、地方戏里；我们的童年回忆在台北城南川端桥畔夏夜的凉座里，那里也有说书、相声，还有唱歌和蒙古烤肉。

念小学时，每到周末晚上，父母亲就带我们上厦门街那家四川馆吃饭。四个孩子的六口之家，靠两支勤奋的笔，负担不轻，母亲常常说我们是“苦中作乐”。低低矮矮木板搭的四川馆紧靠在铁道边上，每次隆隆的火车一过，木屋就惊天地摇起来。那一番天摇地动，就像四川馆入门柜台上的那一罐颜色漂亮又好吃的泡菜，也像那跑堂拖得长长的一声地道四川风味的“一碗担——担——面——”一样，让我们觉得新鲜有趣。

吃完晚饭，我们照例到附近的一家“大”文具店逛逛。母亲说：“每个孩子进了文具店，眼睛就会发亮。”我在店里东看看，西摸摸，什么都好。



母亲最能看穿孩子的心，她慧黠地笑着说：“好像看看都过瘾似的！”

班上有一半同学的铅笔盒和那里头的文具都比我们的好，但我们不觉得自己非要也有同样的才快乐，父母亲给了我们自由和爱，使我们不觉得匮乏。

不过，每回逛文具店，倒也没空手而回过，小手里总会捏拿着一两支香水铅笔或是一块小橡皮擦什么的。迎着晚风，闻着那俗丽的香水铅笔味儿，我们慢慢地散步回家。

什么叫幸福？现在回想，那种感觉就是幸福吧。幸福，在艰苦的岁月中特别动人！

多年前，有一次和母亲聊天，我提起小时候最羡慕会弹琴的人，常常把床尾高起来的横杠当琴键，自我陶醉地弹上半天。母亲说：“我也做过这种事儿，我有一个老九霞的鞋盒子，盒子里住着我用火柴棒做的小脚儿娘，我常常跟同伴捏着自己的小脚儿娘，哆、哆、哆地走到对方的鞋盒里，展开两‘家’的来往。敲门、开门、让座、倒茶、吃东西、聊天，我们假装成大人，假装成家庭主妇，说的都是大人话，爱说什么说什么，不受限于大人，有意思得很。那时，我常在我们北屋套间里玩小脚儿娘。”

后来她写了一篇《我的童玩》，就写到她的小脚儿娘。那个时代，女孩子自己做的玩具和玩的游戏，常常和学女红或做家事有关，



那时的教育多半是在旧式的家庭里自然形成的。母亲写道：“我愿意从记忆中找出我童年的游乐、我的玩具和一去不回的生活。”

母亲晚年用心为孩子写了许多有趣可读的东西。

母亲不但喜欢为孩子们写故事，也给孩子们翻译世界儿童文学名著。她主持的纯文学出版社出版高水平的文学作品，自20世纪70年代后期也开始开辟儿童书的路径。

20世纪70年代末，母亲接近六十岁了，父亲希望我能够多帮帮母亲，于是我辞去原来的工作，到母亲主持的出版社协助编务。我和母亲在台北城南那间小办公室里，面对面工作了十年。那年代没有网络，没有手机，更没有电子书，印刷出版品很蓬勃，尤其是文学和儿童书籍，书市兴旺，只要是好书不怕没人买。母亲编辑点子多，眼光准，又能创新，我们联手编了很多叫好又叫座的书，其中有好几本得到文学奖。她总是乐在工作，有时一大早兴致勃勃地进办公室说：“来，咱们好好把这批书做起来！”

20世纪80年代后期，因为先生的工作，我们带着两个孩子，迁居澳大利亚墨尔本。母亲顿失助手，但是她很看得开，不忘叮嘱我出去后多注意介绍国外的儿童读物给国内的小朋友。

当时台湾《民生报》儿童版主编桂文亚，鼓励我多写些文章



介绍西方社会、风俗文化、学校教育及生活。初抵南半球的澳大利亚，我们家的哥儿俩对四季时序、花草鸟兽、风土人情及语言环境都感到很新奇，每天放学回家总有谈不完的话题。我细心倾听，有时也给他们一些意见和看法，晚上临睡前，就把这些点点滴滴用他们的口气及角度记录下来。后来这一系列“哥儿俩在澳洲”，成了桂文亚主编的儿童版极受欢迎的专栏。而我有个最忠实的读者，就是哥儿俩的外婆——林海音。她说：“我每个礼拜看你的专栏，就知道你们一家子在澳洲的生活了。”

她常常老远地打长途电话给我，电话那头她用清脆悦耳的北京腔说：“今天登出的你那篇《地图王与气象王》真生动，小兄弟俩戴黑眼镜的照片挺有趣的！”或者：“你那篇《韦叔叔捉树鼠记》很有意思，记得我小时候在北方，有一种松鼠很像树鼠，就爱啃天花板。”

后来母亲把《哥儿俩在澳洲》编成书出版，这本书被好几所学校列为暑假儿童读物。

接着这本书的续集由文亚编成《袋鼠跳跃的大地》出版，很受欢迎。文亚又陆续把我在儿童版上刊登的文章编成《天堂鸟与奶瓶刷》及《海角天涯赤子情》出版，很高兴这两本书分别获得金鼎奖及教育主管部门推荐好书。



我们旅居澳大利亚期间，母亲和父亲曾两次来探访。母亲有早晨散步的习惯，有一次她走着走着找不回家了。后来她写了一篇很有趣的《奶奶丢了》。她是这么写的：

奶奶丢了！丢在这地球上的南半球，南半球的澳大利亚，澳大利亚的维多利亚省，维多利亚省的墨尔本市，墨尔本市郊的一个小镇上，奶奶丢了！

澳洲我来过两次，在墨尔本这小镇的女儿家，也是第二次来住了，所以到达的第三天早上六点钟，便依我多少年来的习惯，出家门绕弯儿做“快走”运动。奶奶所以身腿健朗，就全靠二三十年来的这项运动了。

话说全家还在高卧，我全身无牵挂，衣袋里只装了一条手帕便轻松地起步了。我照着前年的方向，出门向右。天空蒙蒙亮，空气清新，这环境没有变，隔壁是希腊人家，有一艘船，假日便驾驶自备船出海。再向前走，啊！白色楼房，是一家中国人的大户人家。再向前走，可以右转了，就这么走下去吧！对的，这段是小坡，上去有一些人家，再走再绕，怎么不见回家的路了呢？也许我转弯转早了，再回到原来转角处向前走。对，这些街道巷名我曾熟识，可是怎么转来转去还是不对呢？但是地名我也都知道。再回头再绕，可是就越绕越糊涂了，连回头路都不对了。怎



么办呢？街上一个行人都没有，难道他们的孩子不是像台湾的孩子，七早八早就背书包上学去？可是我们住家的街名、门牌是什么来着？只记得电话号码，没有公用电话亭，也没有澳币，打不了电话。碰见人也沒有用呀！我又走啊走的，总希望看见希腊邻居的船，就到家啦！这时已经半小时过去了，我的心里未免有些焦急。正在着急时，看见路旁一户人家门口，有一个男人正跨在摩托车上，头戴安全帽。澳洲人真守法，这大清早，街上无一行人车辆，又无交通警察，他却规规矩矩地戴上安全帽。我连忙上前一步说：“先生，请帮一个忙，我走丢了！”那人望着我问：“你家住哪儿？”“我不记得街名了，但是我有电话号码，请为我打一个电话吧！”这时他的太太出来了，两个小孩也出来了，他们都蓬着头，穿着睡衣，是刚从被窝里爬出来的。先生告诉太太情况，要我跟进去打电话，先生就算把我交给太太了。

我随她进屋，原来里面还有两个娃儿在瞪眼望着我这陌生客人。太太把电话拨过去，对方说了两句就挂了！她挂上电话向我耸耸肩表示无奈。我说：“号码应当不会错，请你拨过去我来说。”这次我手握电话，对方一接，我就说中国话：“你是谁？安安吗？”这下对了，女主人告诉我的大外孙（《哥儿俩在澳洲》的主人公）她家住址，安安马上来接。我向蓬头女主人道了谢，上了车一拐两拐就到家了，我的丈夫、女儿、女婿、二外孙都在门口列队相迎，



还有一只可爱的喜鹊，也不怕人地立在草坪上迎接我——澳洲的飞禽走兽，大都和人类亲近。

我问安安：“第一次电话你接到没有？”他说接到了，但他以为是什么不良分子大清早打来的，所以挂断了。

唉！幸亏第二次接通后我自己说话。

我把我迷路的经过告诉了大家，他们也很奇怪我怎么就绕不出这圈子。原来我们居住处街名里有一“弯月”字样，他们告诉我，这一带街巷弯处多，我不知道失落在哪一个“月儿弯弯”里了。安安拿出一张影印的本区简易图，用绿笔边勾画边讲，告诉我几条捷径和记忆的方法，比如出门先过街，见弯就左转，绕一圈就回来了。可不是，用二十分钟“月儿弯弯照九州”地走了一圈，正是我的标准快走时间，看见希腊船，看见了喜鹊，奶奶回家了！

1971年，台湾有一批小学老师参加教师研习会培训，母亲担任指导教师，带领一个写作小组。在她的指导引领下，后来有好几位成为非常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家。

自1968年到1996年，近三十年间，母亲受邀加入台湾小学语文教科书编审会，为全台湾地区的小学生编审语文课本，并主稿一、二年级的语文课本。她把儿童文学的精神和趣味注入原本略显枯燥的教科书，得到社会及教育界的赞赏。低年级的语文课本呈现一番



新气象，那是“林海音风格”。

一位曾经参与编写、教学的教师就说，林海音优美的文字不仅让师生们陶醉，更潜移默化地培养了孩子们善良的人格，这对台湾的教育是了不起的贡献。

小时候，我们常常把家里的几把藤椅倒扣在地板上，长长地摆上一排，藤椅上再蒙上大棉被，我们就在里头钻，像是在地道、碉堡里一样有趣，母亲有时还会帮我们摆，甚至给我们出主意，把几个枕头堆起来，就成了碉堡口的炮台。

她也从来没有进我们房间东搜西寻或是动手整理，她说：“小孩子整理书籍、收拾纸屑、剪贴壁画，有他自己的意思，他自己的房间、自己的东西嘛！妈妈插手其间，破坏了他们的自主力。人天生就有权利与责任感，赋予他权利，他自然就负起责任来了。”

小时候，我们淘气，母亲要发脾气管教时，她常常会“扑哧”一声笑出来，那只要打孩子的手也就“高高地举，轻轻地落”了。有一回，我说：“妈，你干吗要笑嘛？”她说：“我想起我小时候的淘气事儿了。”

有时下过雨，满院子水，我们要求：“让我们光脚丫出去玩好不好？”母亲大都会答应，只要天气不冷，玩完要先洗脚才能进屋。母亲后来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写道：“当我想拦阻孩子去玩



一盆水的时候，忽然想到我小时候在雨地光了脚蹚水的快乐，那么孩子只要求一盆水，实在算不得淘气。”

与母亲接触过的人往往会发觉她是个很有童心的人。儿童文学作家桂文亚说的一段话最传神：“林海音先生无论在讨论事情还是谈天时，都常会不自觉流露出天真，这个天真不是造作，是很自然地把她看见的事情描述出来。由于她从小在北京成长，词汇丰富，再加上感觉敏锐，又是一个小说家，所以叙述的过程很活泼，常把生活中平淡的事说得有趣、写得生动，这样的作品也就很接近儿童心灵及趣味。”

北方人常说“自来喜”，我觉得母亲的儿童文学作品就有一种“自来喜”的味道。

七十六岁那年，母亲写下：“英子的心还是七十六年前的那颗心，把家人和朋友紧紧搂在心上，到老不变。”

七十七岁那年，母亲聆听钢琴家、与她的名字只差一个字的林海为《城南旧事》谱写的一组乐曲，写下了一首略带伤感的回忆童年的小诗：“静静地听，静静地想，回忆我的童年，忽见柳条儿摇曳，柳絮飞扬，柳絮吹向我脸上，鼻孔里刺痒。抚摸着鼻尖，泪珠儿沾湿了我七岁的小手。……我愿在这儿静静地听，向我的心诉求：给我一盏七月的莲花灯，提着它，我——去踏冬月的雪，一步一个脚印，踏到明春。……静静地听，静静地听……”



听到城南的深夜，听到冬阳的早晨。”

七十八岁那年，她许下未来要专注于儿童文学写作的心愿，她说：“我要写我的童玩、我的游伴、我说的话、我读的书、我的小油鸡、我的小疯狗、土地庙的小吃摊、破洋车上老头子塞在我脚下的破棉袄……”可惜这个心愿终因健康因素，半途而废。

2001年12月1日，母亲病逝于台北，享年八十三岁。我在重新阅读她的儿童文学作品时，终于明白为什么那么多孩子喜欢她的文章。因为，她一直是站在孩子这一边的。十三岁失去父亲，仓促结束童年，担负起照顾弟弟、妹妹的责任的母亲，就像是她的自传体小说《城南旧事》里的英子，那个好奇天真的英子，一直在她的心里，从来没离开过。



序

我的东书房与西书房

夏祖丽

我有两个书房，都在楼上，一个面东，一个面西，我叫它们东书房、西书房。

早上，太阳从东边升起，我在西书房写作；下午，太阳直射西方，我到东书房工作。人家是跟着太阳转，我是背着太阳走。

一位在阿德莱德教书的朋友说，他也有两个书房，一个在楼上，一个在楼下。他管它们叫上书房、下书房。早上，凉快，他在上书房工作；下午气温升高，他到下书房工作。

还有一对友人，丈夫用南书房，太太用北书房，每天早起，吃过早餐，他们就不管东西，各奔南北去工作了。

另一个朋友听我们又是东西书房，又是南北书房，还有上下书房的，他也不甘示弱，他说他也有两个房，就是左心房和右心房。我们笑说，我们又不是做文字对称游戏。



我写作一向是“勤能补拙”型。那种手中一支笔，桌上摊着一摞稿纸，灵感就源源而来的事，对我是个奢侈的梦想。（当然，现在许多人用电脑写作，又是另一番景象。）我的书桌上永远堆着大叠的资料、剪报、录音带、录像带以及字典、百科全书……写一篇一千多字的稿子，花在访问、查证上的时间远远超过写作的时间。

查资料、找资料是我最爱做的事之一。我是我们家每天最后看报的人，因为，报纸被我看后就被剪得面目全非了。不管是有关凯利大盗的事迹、比利茶的来源、圣诞老人的历史，还是去哪儿看轮椅舞、哪儿的肉饼最道地……我都分类入档存收。当然现在一切电脑化，资料都存在电脑里。

剪报纸的习惯要追溯到很久很久以前我小的时候。我的父亲是个认真、受人敬重的专栏作家，他每天要看十几份中文、英文、日文报。每天一大早起床，他就一边看报，一边手拿红笔在报上勾勾画画。等全家人都看完报，我们就把他勾的文章剪下来，用回形针别在一块儿，放在他的书桌上，等他下班回来，作为晚上写专栏的参考。第二天，他的一篇篇好文章就上报了。

数十年如一日，父亲每天埋首在书海、报海里，认真写作，苦口婆心地用一支笔，希望把台湾地区带领向一个守法、守公德



的进步社会。

我的剪存资料的心愿倒没有父亲这么大。我只是想让小朋友知道，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人是怎么生活的，有些什么值得多知道点的事。

游一趟悬岩山，我回家立刻找出《悬岩上的野餐》这本澳洲经典名著重读一遍，到图书馆把根据这本小说拍的电影借来看，还得知作者琼·林赛的故居已被列为“国立信托”的托管古迹。

于是，我一通电话打到位于摩林顿半岛的这座老宅，约时间去拜访，想看看老宅是不是也像她的小说一样神秘。

悬岩山、琼·林赛的故居离我住的地方不太远，开车只要两三个小时。

但是，写到澳洲著名儿童文学家梅·吉布斯就不那么容易了。她生前写过、画过的书有好几十本，我花了三天的时间，静静地坐在图书馆的进修室里，把她所有的作品浏览了一遍，找出最重要的几本借回家仔细赏读，做下笔记。

梅·吉布斯和琼·林赛一样，去世后开放故居供民众凭吊。但梅的故居远在悉尼，离我住的墨尔本一千多公里，我只有把它列入有朝一日北上悉尼时的一站。就这样，这篇《小胖壶和小面饼》，经过三年才写成。

也许是事前的准备工作充分，掌握的资料齐全，因此下笔写



时反而十分轻松愉快。

我在澳大利亚的生活尽量过得单纯简单。二十年来，从我的书房到社区图书馆是我来往最频繁的一条路。周末假日，我就按照我收存的资料及列下的行程表，一一造访这些故居，或观看地方节目表演，参观花园、名胜，既休闲，又工作。我家哥儿俩的爸爸张至璋兼任司机及摄影师。

虽然每篇文章都花了不少时间，但当我为小朋友写作时，常常写着写着笑出声来呢！我尽量把自己缩小，把自己摆在儿童的位置和心情上来写。世上还有什么比返老还童更快乐的呢？这得感谢桂文亚，她经常打长途电话（而且是用自己家的电话）来催稿（更正确一点，应该是逼稿），使我不得不“心中时时有儿童”，久而久之，看到好题材就想到写给小朋友。

我的西书房的书架上，陈列着成人看的书籍和参考资料，还有那大本大本厚重的字典。因为，我在西书房写的，是严肃文章。书房里有一种沉重、厚重的感觉。我的《异乡人·异乡情》、《南天下的铃鸟》就是在西书房写的。那本《海角天涯赤子情——小留学生的故事》有部分也是在西书房完成的。

我的东书房却是另一番景象。书架上的书多半是儿童和青少年的，光是颜色就要活泼多了。不但有书，我还有鸚鵡、袋鼠、考拉这些小动物（玩具）陪伴，我的那只考拉还会唱澳大利亚国

